

“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王铭铭 杨正文 彭文斌

[摘要] 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西南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会学者们围绕西南区域人类学发展史、边疆、民族与“他者”的文化历史构建,西南少数民族的社区、族群认同、文化传习和表达的政治,藏彝走廊研究和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效。研讨会具有跨国、跨地区、跨族群、跨学科、跨学术时段的特点。

[关键词] 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研究范式;学术交流;学术合作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07)10-0015-04

作者简介: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1;杨正文,男,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四川成都 610041;彭文斌,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聘任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Crossing Borders and Paradigms: Anthropology of Southwest China Reconsidered)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7日—10日在云南大理古城举行,这次国际学术会议还得到美国 Wenner-Gren 人类学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及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的支持。本次会议由王铭铭、杨正文担任学术召集人,彭文斌担任海外协调人。来自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此外,参与会议的还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院校的5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研讨会结束后,由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生联合召集的中国西南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读书报告会于8月11日至12日在大理喜洲举行。两个阶段的学术活动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中国西南人类学的研究基础

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西南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自1920年代至40年代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大夏大学的岑家梧先生、华西大学李安

宅先生先后倡导“西南民族研究”以来,西南人类学研究高潮迭起。抗战时期,在建设西南复兴基地的过程中,西南边疆研究蔚然成风。1950年代,西南也成为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的核心区位。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的开放,西南边疆的人类学研究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在海内外学者的推动下,西南研究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觉和国际化的进程,西南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开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型,实现了从阶级分析、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向多元民族文化和边疆现代化研究的转变。

在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前辈马曜、李绍明、童恩正等先生的推动下,西南民族学界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考察活动,包括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贵州六山六水、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专题研究,掀起了改革开放以后西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西南民族学会的倡导下,以田野考察为基础,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为命题就成为了这次高潮的特点。这些由西南本土知识分子主导的学术研究项目,也标志着西南边疆研究中“文化自觉”的开始。1990年代初,在全球化的学术反思思潮影响下,西南地区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以文本研究为主导,出版了西南研究的系列丛书,反思华夏中心的历史框架,力求从西南自身的人文生态文化来建构西南的本土话语,丛书及相关论著的出版,标志

着西南研究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和西南知识群体“文化自觉”的进一步发展。19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随着系列合作项目(如“藏彝走廊研究”等)的开展和专题会议的召开,北京和西南地方学术机构的密切合作,港、台和欧美学者的共同参与,西南边疆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和国际化的研究趋势,正在走向第三次学术高潮。在这些系列的学术高潮中,海内外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也陆续出现“族群模式”(ethnicity model)、“区域模式”(regional model)和“跨境模式”(transnational model)。

近20年来,海内外学界曾经多次出现以中国西南区域文化为框架的学术专题讨论或会议。在国内学界,由著名民族学家马曜先生、李绍明先生等主导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先后举办了12次有关西南少数民族族群、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专题讨论和会议。近些年来,在美国的亚洲研究年会上,也不乏以中国西南区域空间为架构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族群文化与历史的讨论。

以上这些学术活动,都为本次以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学术反思为主题的国际性工作会议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会议的研讨主题

本次研讨会的学术目的定义为梳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港台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西南地区人类学和史学研究成果,探索西南边疆族群文化与历史研究的范式与合作模式。作为海内外学者首次以西南框架为基调的、以区域民族文化研究的学术反思为基本关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对话、交流、合作,共同促进西南区域人类学和边疆史学的发展”乃是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会议为期四天,分为主题发言、专题讨论、专家访谈等内容。与会学者围绕西南区域人类学发展史,边疆、民族与“他者”的文化历史构建,西南少数民族的社区、族群认同、文化传习和表达的政治,藏彝走廊研究,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此外,会议还就西南民族地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百年史、西南研究的理论、方法、意义和表达途径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以“追述西南研究百年史”为核心的相关专题讨论

在本次会议的主题发言上,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 Michael Rowland 教授、伦敦经

济学院人类学系的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的王富文教授(Nicholas Tapp)分别从非洲、汉区和中国西南的角度讨论了文明进程、区域和族群关系等问题。著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严汝娴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明珂研究员则分别从学术回顾、社会形态、方法论、族群理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在西南研究中的实践过程。

本次研讨会的一个要点是探讨西南民族地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百年史。李绍明教授、严汝娴教授和王建民教授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给予了概括。李先生总结了百年来西南民族学研究史,为后续讨论奠定了良好基础。严汝娴教授通过个人研究经验的总结,展示了1950年代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民族学前辈承前启后的学术经历,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西南民族研究的历史变迁。王建民教授则用第三者的眼光看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既阐述了西南本地学者的成就,又呈现了这个地区在1950年代之前得到的全国性关注。三位学者的精彩发言为我们梳理西南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历史状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围绕这条线索,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见解,我们将西南研究的历史划分为1950年代前、1950年代及198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

关于西南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有些论文涉及到来自海外的职业民族学家或非职业的民族志作者的论述。如张兆和教授、Thomas Mullane 教授和彭文斌教授等所作的报告,其视野超出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范围,但论述的内容与该学科的历史紧密相关,他们独到地指出,对于西南的民族学、人类学和“半学术”论述,都值得研究者们深切关注。他们对于西南论述的深入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1950年代前中国民族研究的知识史基础提供了难得的线索。1950年代之前,国内外的职业和非职业民族学研究者对于西南地区的社会群体已进行了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有的基于古代方志,有的基于民族志考察,有的基于西方知识,更多的则基于这些探索的综合,这些分类对于195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分类产生了影响。学者们据此指出,19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这段“特殊历史”应该给予足够的

关注,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成就之一。

关于西南研究的第二、三个阶段,学者们直接或间接地对 1950年代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性回顾,也有不少学者集中探讨了 1980年代以来的“民族表征”。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围绕着摩梭人的表征作了精彩发言,隐含的深意在于揭示百年来西南民族在成为汉族的“他者”过程中,得到的形象曲解。潘教授的发言还由此延伸到表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等认识论问题。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则跳过了地区性学术反思这个环节,直接跨越到了一个更大的研究范畴。他从古今国家过程的演变来看西南的“中原建构”问题。云南大学沈海梅教授围绕西方和中国学界对西南的不同表达展开反思,批判了外来的“东方学”与“内部的东方学”。关于西南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与会学者们围绕有关问题作了重要的反思,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对近几年来西方人文表述危机之后出现的反思进行了细致梳理,针对西南研究表征论的泛滥现象,指出表征的反思应回归于对事实的尊重,应回归于事实与其他领域之间关系的经验考察。与此相关地,诸如 Beth E. Noar 教授提出的“人类学表征”说,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此外,对于西南的外国知识、中国知识和本土知识如何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对话,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杨正文教授指出,在过去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民族学及史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过度依赖各种历史文献、地方文类的现象,而这些用汉语文书写的文献、文类在生产过程中有挪用或受到外来书写格式、风格以及文化翻译的局限,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理解所研究对象的深层文化的藩篱。这个观点涉及到文化翻译的根本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深思:西南的外国知识、中国知识和本土知识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这几类知识之间在未来应形成何种关系?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关于西南研究的理论、方法、意义和表达途径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要点是围绕着如何研究西南,研究西南的意义、方法和表达途径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四川大学石硕教授对于碉楼建筑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张建世教授对于工艺人的研究,云南大学杨慧教授、贵州大学张晓教授等对于旅游和边缘人的研究,都把西南地区看作一个

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分别揭示了该地区建筑的神圣与世俗,宗教与社会,物质文化与社会结构,物品和人的流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现象。台湾中研院何翠萍教授,则以人类学的优秀理论为依据,以详实的民族志个案,分析了西南地区的人观和社会空间特征。这些学者皆以西南为研究对象,将西南当作演示方法与理论观点的实验地,对于我们认识西南给予了不少启发。另外,有的学者则把西南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探讨由地区研究引申出来的方法论和一般启发意义等问题。比如,王明珂教授将西南定义为一种多重边缘地带,试图通过多重边缘性的把握来呈现和表达这个地区的文化特征。挪威奥斯陆大学 Koen Wellens 教授,则通过个案分析,揭示了西南的宗教多重性特征。张江华、梁永佳、赵丙祥、罗惠翻等几位教授也是围绕这个地区的特征展开研究的。上海大学张江华教授,通过考察“得福”与“回福”之间的“交换关系”,揭示了民族地区民族志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教授试图在这个地区发现的“隐士”这一社会存在类型,试图通过挖掘这种人的生命史来表达这个地区土人与王权之间关系的特征。中国政法大学赵丙祥教授的研究资料虽然来自东北和山东,但他也试图提供一个对西南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模型,这个模型非常强调研究对象的流动性特征。罗惠翻教授集中分析了云南的一个回族社区,这类社区恰好是西南地区流动性特征的关键表现。这些观点与王明珂教授的族群间性及 Koen Wellens 教授的宗教间性论点相互呼应,试图从西南研究中发现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模式。

“西南”到底是研究对象,还是学术新方法、新范式的来源地?王铭铭教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入把握,有助于学术认识的更新。关于西南研究如何走出西南、西南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非西南”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如何等问题,虽然还有待更深入的讨论,但国内外老一辈学者们的看法,对于西南研究的视野开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除了李绍明教授、严汝娴教授的学术史论述之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进行的方法论阐述,对于西南研究同样给予了精彩提示。此外,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Michael Rowland 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Nicholas Tapp 教授分别从非中国、中国、中国西南

少数民族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Nicholas Tapf教授对于今日西南的地方性、全球性和历史流动性之间关系的思考,有力地回应了西南研究中的族群间性和宗教间性问题,这对于我们认识流动间性和“隐性”也有重要帮助。似乎与西南毫无关系的 Rowland和 Feuchtwang两位教授,分别对区域人类学研究与文明人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Rowland教授告诉我们,要进行地区研究,首先要把人类学家以前习惯于做的地点研究与他历史上地点与外面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一个联系。制图是认识这种联系的基础。在西南地区实践这种“制图法”是否有必要?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所作的详实的文化区图式解析来看,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Feuchtwang教授与 Rowland教授的观点相互呼应与补充。如果说 Rowland教授的演讲并没有关注地区内部关系的等级性的话,那么 Feuchtwang教授则从帝国的文明进程角度为我们提出了地区研究的框架问题,重点指出了帝国中心、地区中心、当地中心的多重性与等级关系。

本次研讨会除了在西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外,还召集参会研究生对海内外西南研究专家进行了深入访谈,并举办了一次两岸三地人类学家圆桌会议,参观了大理地区著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

“跨越边界与范式——中国西南人类学的再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欧美及两岸三地一

批知名学者,具有跨国、跨地区、跨族群、跨学科、跨学术史时段的特点。学者们对本次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殷切期望。李绍明先生指出“西南是中国的西南,世界的西南”,希望西南成为国内外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平台。Rowland教授提出,这次研讨会使他更坚信,要综合范畴、身份、日常生活行为的研究。台湾中研院黄树民教授认为“传统的学科一般是把边区、边境研究当作落后的学科,但是 10年来,不论是地理学、人类学还是生态学,学者们都看到,边区、边境的研究隐含着更大的生命力。”他希望“西南地区人类学研究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王建民教授提出“我们从事西南人类学研究,既要深化地区研究,又不要受地区研究的框框束缚,要更好地去思考学科性的东西,通过反思地区研究的局限,扬长避短,共同促进中国人人类学的进步。”本次会议在对西南学术研究进行反思的同时,融入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表述的深切关怀。海内外学者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交流与对话关系,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对于推动西南区域人类学和边疆史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对于促进学界对中国西南这一历史/人类学宝库的进一步了解,都有着开拓性意义。

收稿日期:2007-09-05 责任编辑 李克建